

第七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与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推动国民党当局成立抗日救亡团体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害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超出自己的控制，尤其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它所推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要给抗战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和方案，希望能够影响、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动员全国民众，实现全面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

北海在抗战初期，为了与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相适应，加快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重建与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加强党的领导，是当务之急。而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如何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国民党统治区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负起团结人民、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重任，并推动北海国民党当局实行抗战的政策措施，成为最主要的任务。

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由于北海地区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势力强大而初建的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则处于发展状态。在国统区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因此，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国统区的党组织继续保持秘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迅速打开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新局面，关键在于将分散的抗日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建立由党秘密领导的统一的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团体。于是，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学习总结，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下，遵循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较好地处理了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和限制，把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推向高潮；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军政当局实施抗战措施，建立军民合作关系，推动国民党当局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1938年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北海人民也热情地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兵舰、飞机不时炮击轰炸我国沿海地区，北海成为抗战的前线。2月，受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派遣的赵世尧回到北海之后，一边着手重建北海党的组织；一边推动

国民党当局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动北海各界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3月，为了取得北海区镇政府的支持，以便于开展抗日救国工作，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市性的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机构。因此，在以赵世尧为首的北海党组织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取得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以北海区署的名义，召开了全市的机关、学校、团体、驻军和社会贤达代表的联席会议。与会代表出于崇高的爱国热情，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全市性的支援抗战的领导机构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以便进一步发动北海各界人民起来进行各种支援抗战工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会议选举产生一个由8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选出常委3人：黄宗达（北京大学毕业生，社会贤达）、庞达（庞继业，合浦一中教师、党员）和黄炳钿（国民党一七五师五二五团团团长），黄宗达担任主任委员；委员5人：国民党北海五区区长刘瑞图、北海镇镇长黄元昭、合浦一中校长劳开连、北海商会会长吴炳荣及海关关长。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的经费由各单位提供解决，其中商会和海关是提供经费的主要单位。与此同时，合浦县也推动国民党当局成立了合浦民众抗敌后援会，以便发动合浦各界人民起来进行各种支援抗战工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的成立，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在北海形成，预示着北海抗日救亡运动新阶段的到来。

3月至4月，为了充分利用这两个抗日救亡团体，团结各阶层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级党组织指派共产党员赵世尧、张进煊、李英敏、伍雍娴、王文崑等分别加入这两个抗日救亡团体。由于这些党员都是在进步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中较为活跃的人物，因此他们在抗敌后援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赵世尧担任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组织联系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项工作；张进煊担任合浦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指导股长、王文崑任文字股长、李英敏任谍报股长，李英敏、伍雍娴、黄文楷还被选为委员。实际上，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黄宗达、黄炳钿、刘瑞图、黄元昭、吴炳荣等只是挂名的，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赵世尧负责。赵世尧利用其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总干事的合法身份，积极推动了北海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组织各会员学习讨论有关抗战形势、统一战线等问题，组织宣传队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同时，赵世尧还进行了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的工作，先后发展党员李梓明、何醒予、卢冠群、张书坚、赖刚等。张进煊等在合浦县民众抗敌后援会中，争取团结了该会的常务委员蔡振伟、宣传组主任张存芳、艺术股长韩朗周等爱国民主人士，使该会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共党员的手中。1938年春，张进煊还加入了合浦民众动员委员会，并当选为委员，以便推动社会团体广泛开展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促成合浦县各地团结抗战局面。

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是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是在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下领导公开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它在团结广大青年、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国民党北海当局抗日、培养干部和为发展党组织输送后备力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北海党组织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下，遵循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发动群众对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较好地处理了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1938年6月，在中共合浦特支的发动和领导下，廉州各抗日救亡团体于东校场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揭露国民党一七五师政训处处长李焰生散布反共、主张妥协的反动论调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北海各抗日救亡团体也加以声援，终于逼使国民党顽固分子李焰生调离合浦。

8月，正当合浦一中学生的政治思想不断提高，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合浦县政府任命叶天一为合浦一中校长。叶天一属于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他在任合浦五中校长期间，不准学生读进步书刊，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散布反共言论。合浦县政府委派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既是因为他在合浦五中声名狼藉，呆不下去了，又是利用他压制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虽不太成功但经验颇丰的“优势”来遏制合浦一中蓬勃发展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举两得。但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合浦一中学生，怎能容许这么一个反动人物任合浦一中校长呢？于是，合浦一中学生便进行了一场反对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的斗争。

反对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的斗争是在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合浦特支书记张进煊、委员赵世尧得知合浦县政府任命叶天一为合浦一中校长后，便召集合浦一中党支部成员召开会议，研究反对叶天一斗争的对策。会议对这场斗争的意义、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以及应该采取的斗争方式方法等，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指出，这场斗争意义重大，它不但关系到合浦一中，而且还关系到整个合浦地区能否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壮大抗战进步力量、打击反共顽固势力的大问题。斗争的有利条件是：当前抗战进步是主流，反共顽固分子不得人心；叶天一已经遭到合浦五中学生的唾弃，反对叶天一的斗争一定得到合浦一中学生的拥护。还有地方上层人士曾经酝酿委派合浦实力派人物周胜皋担任合浦一中校长，反对叶天一的斗争也会得到地方上层人士的支持。斗争的不利条件主要是：合浦县县长邱桂兴属于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而且邱桂兴与叶天一私交颇深，要邱桂兴收回成命会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要实施抗战教育，反对奴化教育。对合浦县政府，要明确表示不同意任命叶天一为合浦一中校长，要求县政府另外委派能实施抗战教育的人士任合浦一中校长。对叶天一，我们要针锋相对，同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合浦县上层和社会人士，要积极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会议决定：(1)团结一致，坚决抵制叶天一到合浦一中任职；(2)组织请愿团，向县长邱桂兴请愿，要求撤销对叶天一的任命；(3)争取廉州中学学生的支援和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会后，合浦一中党支部通过召集学生开会和个别串联，把合浦县特支有关反对叶天一斗争的意义和斗争的方式等意见，与学生们商量之后，学生们都表示赞成。于是，大家开始大造反对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的宣传攻势，把“打倒反共顽固分子叶天一”、“不准叶天一踏进合浦一中

学校”等标语和《告同学书》、《告合浦父老同胞书》等传单在学校内外张贴散发，揭发叶天一搞奴化教育，不准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罪行，指出叶天一没有资格任抗战时期的学校领导职务，坚决反对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要求合浦县政府另派贤能代替叶天一。此时，反对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便成为北海、廉州民众街谈巷议的话题。与此同时，合浦县特支委派李英敏、赵世尧向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潘荫玑等打过招呼，说明拒绝叶天一当合浦一中校长而拥护周胜皋当合浦一中校长的目的，又由潘荫玑等向广东省抗日自卫队第十三统率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作了说明，因此得到邓世增的默许。合浦一中党支部也派代表会见国民党北海第五区区长刘瑞图，做了刘瑞图的统战工作，取得刘瑞图的同情和支持。

当叶天一两次到合浦一中，一次被学生拒之校门外，一次被学生赶出校门之后，叶天一并没有因此知难而退，竟然以校长叶天一的名义发出布告，招收合浦一中新学年的新生，企图以此造成叶天一是合浦一中校长的既成事实。针对招生问题，合浦一中党支部与学生商量对策，并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贴出与招生布告针锋相对的通告，劝说准备入学的学生不要参加以叶天一名义的招生考试，并说明即便是参加了考试也无效；二是如仍有人应考，要捣毁考场；三是劝说教职工，不要替叶天一办理招生的事。经过学生们的努力，使叶天一在北海招生失败。但叶天一并不甘心北海招生的失败，他把招生考试转移到廉州举行。合浦一中党支部和学生们知道这个情况后，组织60多名学生在廉州招生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从北海连夜赶到廉州，继续破坏叶天一的招生意图。与此同时，合浦县特支委员李英敏布置参加廉州中学夏令营的学生，支援北海学生反对叶天一的斗争。于是，两地两校学生在考试当天会合在廉州招生考场上，劝阻应考学生不参加考试。这样，叶天一以招生来达到登上校长宝座的企图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在挫败叶天一的招生图谋之后，合浦一中党支部派代表庞自、耿宪修等会见邓世增，向邓世增陈述反对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的理由，强调合浦县人才济济，能胜任一中校长的大有人在；叶天一不受学生欢迎而仍任命他为合浦一中校长，这是因为他与县长邱桂兴有交情等等。邓世增听后，既要求学生不要干预政府的事，又对学生的合理要求表示同情，并答应将学生的意见向县长转达，同县长商量解决。与此同时，从北海到廉州的60多名学生，与事先由李英敏、李华良、罗文洪组织的廉州中学夏令营学生200多人一起到合浦县政府请愿。支援请愿的还有合浦日报社等文化界人士和廉州市民。请愿群众聚集在合浦县政府门前，要求县长邱桂兴接见和回答问题。但是邱桂兴不愿或不敢出来接见请愿群众，只叫其秘书出来传话，要请愿群众选派5名代表到县政府里面与邱桂兴面谈。经商议推举合浦一中代表庞自、耿宪修、宋家培，合浦日报社代表李英敏和“大众剧团”代表罗文洪，进入县政府与邱桂兴会谈。其余群众在县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等待谈判结果。代表们在会谈中，陈述了撤销叶天一合浦一中校长任命的理由，指出叶天一只是私立大学毕业，不是正规大学毕业，学识浅薄，威信不高，任合浦五中校长期间，阻挠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有违“抗战建国纲领”要求实施抗战教育的宗旨。因此，请县政府另选能实施抗战教育，发展合浦教育事业的人任合浦一中校长。邱桂兴听得不

耐烦，打断了代表的发言，并指出：谁能任校长，该派谁任校长，这是政府的事，不管你们是学生还是什么人，都不应该干涉，也无权干涉政府的事。代表们却指出：实施抗战教育是抗战建国大事，是政府的事，也是群众的事。群众要求撤换不适宜任合浦一中校长的叶天一，这有什么不应该！邱桂兴被激怒了，指出自己是个军人（邱桂兴是合浦驻军团长兼县长），只讲纪律，绝对服从命令。现在政府的任命已经发出，群众就得服从，不要再滋生事端了。于是邱桂兴便径自离开了会议室。

会谈被迫终止后，谈判代表便想出来与县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的学生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不料，县政府警卫不让代表出门，谈判代表便有意在传达室坐下来，造成谈判代表被扣留的既成事实。谈判代表被扣留的？消息很快就传开，顿时激起请愿群众的义愤，大家高呼：“不准限制代表的行动自由！”“不准扣留请愿代表！”这时，县政府秘书气急败坏地跑出来，诬蔑群众要暴动，从而激起请愿群众更大的义愤，纷纷责问这个反动家伙把请愿诬蔑为暴动是何居心、该当何罪？并要求邱桂兴出来接见群众，否则大家就不走开。县政府秘书自知理亏，便退缩回去了。

僵持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邱桂兴只好出来接见请愿群众。李华良等向县长提问：现在正是团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已经公开表示实行民主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群众为了请县政府撤销叶天一的任命，按照县长的要求派出代表和县长会谈，完全是遵纪守法行事的，为什么竟公然扣留请愿群众代表，还指派县政府秘书诬蔑群众要暴动？县长实行的是什么政治？请县长当众说清楚。邱桂兴自感理亏，为了缓和气氛好下台而向群众道歉，指出刚才秘书说过暴动的话，纯属个人失言，现在声明纠正。至于扣留代表，那是卫兵在执勤中一时失职产生的误会，他并无扣留代表之意，现在宣布撤走岗警，代表完全可以自由进出。最后，请愿群众向县长提出撤销叶天一的任命的要求。邱桂兴指出：叶天一的任命已经发出，要改变得重新研究才能答复大家。这样，反对叶天一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请愿群众也就退出县政府，再研究下一步行动。当晚，学生们群情激愤，集队到街上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政府扣留谈判代表”、“反对叶天一任一中校长”等口号，直到深夜，震动了廉州城。

第二天，《合浦日报》以大标题刊登了合浦一中学生在廉州中学学生和合浦文化界的支持下，为反对县政府任命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向县长邱桂兴请愿，县政府竟将谈判代表扣留，反诬请愿群众暴动的详细报道。邱桂兴的倒行逆施一经公之于众，立即遭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非议和指责。邱桂兴慑于社会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取消了对叶天一的任命。

反对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的斗争，经过约半个月的口诛笔伐，反复较量，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邱桂兴不得不彻底认输，收回成命了。至于委任谁接替叶天一呢？合浦县特支提出了合浦一中校长人选的三个条件：实行抗战教育、推进抗日救亡运动、聘进步教师。并由合浦县特支书记张进煊委托庞达与合浦县各派有关人士商量，结果由答应上述条件的周胜皋出任合

浦一中校长。周胜皋接任合浦一中校长后，由谭志伟担任教导主任，杨超兰担任训育主任，聘请了进步教师韩瑶初、陈任生、郑樵秀、庞达、宁德棠（宁文）等为教员，聘任赵世尧为合浦一中图书馆主任，并保证了合浦一中抗日救国活动的自由和改进教学设备、条件等。韩瑶初、陈任生到合浦一中任教后，由韩瑶初兼任合浦一中党支部书记，由陈任生对新党员上党课，进行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在教师、学生中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从而使北海党组织的干部力量加强了。

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胜利，锻炼了参加斗争的党员，加强了北海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巩固了统一战线，推动了北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北海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的方针和广东南临委所提出的“应当迅速开展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团队的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官兵一致抗日，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的指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国民党当局实行抗战的政策措施，以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北海地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人物有：广东省抗日自卫队第十三统率区主任、原国民党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后任广东省第八行政区专员）；国民党北海第五区区长刘瑞图；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潘荫玑；合浦一中校长周胜皋；国民党合浦县县长邱桂兴；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这些人尽管其政治背景和想法不同，但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都不得不表示出对抗日救国的某些热情，这就为北海地区党组织开展这些人的统战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邓世增是地方实力派人物，为了扩大势力捞取政治资本，他也常以反对镇压抗日运动的姿态来抵制第八区专员吴飞、合浦县县长邱桂兴等外来势力。北海党组织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邓世增在某些事件上对党组织进行支持。邓世增周围聚集了一批地方实力派人物，其中有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潘荫玑、合浦一中校长周胜皋、廉州中学校长蔡振伟、地方绅士伍瑞楷等。每当邓世增与这些人一起召开会议商议重大事情时，北海党组织就派李英敏以合浦日报社代表的身份参加他们的会议。由于潘荫玑、周胜皋、蔡振伟、伍瑞楷等人都比较开明，因此李英敏在会上每提出代表党组织的主张时，都得到他们的支持，邓世增也得随着赞同。1938年8月，在中共合浦特支发动反对叶天一斗争之前，党组织委派李英敏、赵世尧向潘荫玑等打过招呼，说明拒绝叶天一当合浦一中校长而拥护周胜皋当合浦一中校长的目的，又由潘荫玑等向邓世增作了说明，因此得到了邓世增的默许。当县长邱桂兴扬言对请愿学生动武时，邓世增以学生们都是世家子弟，出了事不好办为由，阻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北海党组织领导的反对叶天一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虽然这时北海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但国民党当局已从张进煊、赵世尧、王文崑、李英

敏等的言行中，察觉了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基于这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仍然采纳了他们的抗日主张。而且由于北海党组织对统战工作做得好，在国民党开始防共、溶共和反共的时候，一些地方开明人士还设法保护了这些党员。1939年底，廉中校长蔡振伟参加一个会议回来后，向廉中党支部书记钟高鉴透露：国民党当局制定了许多规定来限制共产党，许多老师挨点了名，主要是张进煊、张存芳等老师，提醒老师们要注意。从而使党组织及时得到有关信息而做好了安排。北海党组织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仅发展了抗日队伍，而且也保护了党的组织。

林增华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大革命时期，林增华加入了共产党，又兼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大革命失败后，林增华脱离了共产党，但保留了国民党党籍，抗战前到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随国民党一七五师来到北海。因此，林增华较易于与共产党员接近，刚到北海即主动到各抗日群众团体听汇报、作指示。这样，林增华就熟悉了赵世尧、张进煊等，并凭直觉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并不难为他们，反而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北海党组织也就趁机派一批党员与林增华建立了联系，促使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支持党组织所从事的抗日工作。1938年秋，林增华为了吸收更多的青年参加抗日工作，采取增人不增薪的办法，扩大了一七五师政工队，并将他所得的主任应酬费划入扩大政工队的费用，吸收了一批中共党员加入了政工队，拓展了北海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他还按照北海党组织的意图，以一七五师政治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合浦抗日青年代表会议。对社会上出现的反共迹象或事件，他都主动与北海党组织联系，表明维护团结抗日的态度。1939年春，防城县出现国民党驱逐进步教师的事件，林增华及时将情况告知了王文崑，意欲让王文崑转告北海党组织进行防范。1939年5月，中共合浦组织被破坏，县委书记李士洋等被捕。林增华除了电告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政治部、第四战区政治部和四十六军政治部，申述国共合作的大义之外，又利用去广东韶关的机会，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共党员区梦觉，嘱咐区梦觉向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并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1939年11月，为了建立一支合法的青年学生抗日队伍，中共合浦县廉北区委和北海党组织通过共产党员李梓明的兄弟李坚（刘瑞图的秘书）与刘瑞图的关系来做刘瑞图的思想工作，使刘瑞图同意由区署提供枪支弹药和经费，组建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

利用国民党要害部门从事抗日工作

在国共合作抗日形势下，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派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任职，从中掌握情报和部分权力，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服务。

1938年9月，涠洲岛沦陷，北海成了前线，收集日军情况，及时监视和分析形势动态是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听取赵世尧汇报北海抗日团体工作时，对赵世尧提到的涠洲岛日军情况和海面走私情况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还交代以后有类似情况要及时向其报告。并提出成立一七五师政治情报组，要求赵世尧兼做情报组负

责人。此事事关重大，赵世尧立即向合浦县工委组织部长韩瑶初作了汇报。县工委研究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情报组调查涠洲岛海面日军活动情况，进行防奸防特工作。于是同意赵世尧加入情报组，并派庞达、郭芳、郭兆荣、罗刚、郭其英、周志刚、陈辉等一批党员参加情报组。情报组成立了中共支部，由赵世尧任书记，庞达任情报组组长。这批党员利用这种特殊工作的便利，积极进行防特防奸等抗日活动，并为党组织掌握敌、友、顽（顽固派）各方情报和掩护党的干部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指令合浦一中校长周胜皋兼任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对曾支持他任合浦一中校长的中共党员庞达、陈任生有好感，便提出要庞达或陈任生随他到县党部任职，协助他工作。陈任生则以合浦县工委委员的身份指派庞达到县党部任职。周胜皋对庞达一直都十分信任，这时更是言听计从，庞达就利用与周胜皋的这种关系，推动周胜皋担任合浦抗先总队的副总队长。因此，周胜皋支持和参加了合浦青年代表大会，并将国民党一些重要情报及时转交中共合浦组织。不久，庞达接到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下发合浦县政府的密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立即秘密地转送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人李士洋、陈任生、李英敏阅看，使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能及时知悉国民党顽固派图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动向，作出对策。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还努力做好国民党地方实权派亲属的统战工作。邓世增的侄子邓登、侄女邓爱莲分别在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读书，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们积极追求进步，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为了巩固和发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于1939年、1940年先后发展了邓登、邓爱莲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关系，所以他们参加的进步活动总能在国民党合浦县当局中产生一定震动。在反汪反逆流的斗争中，邓爱莲公开与合浦县政府顽固派作斗争，得到了合浦群众的广泛支持。邓世增的另一个侄子邓松，则按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党支部书记的指示，打进了国民党合浦县第八区专员公署，并很快获得了担任广东省南路游击指挥部译电员的关键职位，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1940年4月，邓松获悉国民党合浦县政府将派兵镇压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白石水地区群众，便及时将情报报告了中共北海地方组织，使北海党组织及早做好准备，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白石水的进攻。

此外，北海党组织还派一批党员到国民党各区、乡政府和国民党地方部队工作。如李梓明任北海西镇镇长，张义生任博白虎岭乡乡长，严福远任合浦乾体乡乡长，石起任西场乡乡长等等。庞自、王资桐、王文崑、伍朝汉、岑月英、罗永莹等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则参加了国民党南路第九游击队。这些同志利用合法身份，一方面团结和教育国民党下层机构人员，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另一方面又利用职务便利掩护中共合浦地方组织的活动，为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以及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团结抗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北海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有关“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方针，积极开展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避免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北海党组织的影响，而且能在斗争实践中注意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要表现在：(1)在组织上、政治上坚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团体的独立性，极大地发展壮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2)坚持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并批评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尽可能争取民主与改善民生；(3)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对国民党的两面性有较清醒的认识，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对其抗日的积极一面加以拥护、支持和推动，对其反动和消极抗日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与原则的斗争。

二、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涨

青抗会、工抗会、妇抗会的成立

1938年初至1939年底，是北海地区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时期。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下，北海地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结束了过去的自发状况，进入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长远目标和当前斗争目的的新阶段，各界人士纷纷起来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宣传抗日道理，唤起民众投身抗日，使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形成了北海地区又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1938年3月，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成立后，为了深入发动各界民众支援抗战，分别组织成立北海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北海工人抗敌同志会（简称工抗会）和北海妇女抗敌同志会（简称妇抗会）。青抗会是由中共党员罗刚、王文崑、李梓明等组织青年在北海文明路市场商店楼内成立的，参加青抗会的有合浦一中毕业学生、青年教师和社会青年等200多人。10月，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青抗会建立党内青年小组，由郭芳任组长，罗刚和李梓明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青抗会的活动形式主要是组织宣传队在市区街头进行抗战宣传、教群众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战话剧。还在学校假期与合浦一中学生联合组织宣传队到郊区、农村进行抗战宣传。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青抗会还重视平日学习，经常举行时事和政治座谈会，讨论抗战形势和统战问题等。工抗会是由中共党员张书坚等组织店员工人、理发工人、手工业工人等在北海文明路市场商店（青抗会楼下）成立的，参加工抗会的有100多人，主要教育动员工人起来支援抗战，参加救亡运动。妇抗会是中共党员何醒予、卢冠群等组织青年妇女在北海吴家园成立的，参加妇抗会的有合浦一中女学生、社会女青年、纺织女工和一些家庭妇女等200多人。妇抗会的活动主要是深入各阶层妇女中宣传抗战道理，发动妇女起来支援抗战，进行各种战地服务的活动。

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还发动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了救护队、募捐队和壮丁队。救护队平日学习战地救护工作，紧急时出动救护。当日军飞机轰炸大水沟时，死伤群众数十人，救护队立即出动，进行抢救护理，获得了各界民众的好评。募捐队到各商户和群众中发动民众募捐衣服

钱物，救济涠洲岛及其他沦陷区逃来的难民，慰问边防战士。有时还发动群众协助驻军构筑防御工事，表现了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军民合作的情谊。壮丁队由各团体的男女壮丁组成。北海党组织派李梓明任北海镇副镇长兼壮丁队副队长，对壮丁们进行政治教育，以提高男女青年的思想觉悟。并从中挑选一部分精壮人员组成约有 30 人的大刀队，加以特别的训练，准备在日军从涠洲岛登陆北海时与之肉搏、血战。有几次在敌情紧张时，大刀队在李梓明和罗礼仁的率领下，担任海防线的巡逻警戒，掩护群众有秩序的疏散。

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组织成立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简称经绝会），作为附属机构，负责查缉日货。经绝会下设调查组织和鉴定组，参加经绝会的多为工商界人士，并推选潘承璠为负责人。如果查出确实是日货的，由经绝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没收，将货款作为抗日的经费。1938 年夏，经绝会查缉到一批进口改装的“碟牌硫化石”日货，货主是合浦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潘承璠因惧怕货主的权势，不敢严肃处理。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便发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并争取驻军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对潘承璠和经绝会鉴定组施加压力，由经绝会宣布没收了这批日货，将货款作为抗日的经费。货主对此不服，便勾结合浦另一个官僚地主一起对抗，硬说无理没收其货物。接着，《北海日报》刊登了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组织人员撰写的文章，严厉抨击货主的错误思想行为。北海商界人士也指出，这时进口日货是助长了日本力量，而没收日货并将货款作为抗战经费是爱国行动。至此，货主才无话可说。这个案件遂以抗日进步力量的胜利而结束。

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还邀请诗人陈芦荻（陈培迪）到合浦一中图书馆为青年学生朗诵革命诗歌《我是火，我是剑》，以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北海商会门前举行时事座谈会，由庞自、郭兆荣发言，希望大家认清形势，积极加入抗日行列。又由青抗会、妇抗会和一七五师部政治队联合举行“纪念鲁迅晚会”。晚会由李梓明主持，郭兆荣发言，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精神，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批评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虚伪嘴脸。

与此同时，合浦民众抗敌后援会也组织成立青抗会、工抗会、妇抗会，深入发动合浦各界民众支援抗战。

1938 年 6 月，中共合浦特支派党员伍雍娴、李华良分别在廉州镇、廉州中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并在廉州镇组建合浦妇女抗敌后援会，会长为刘淑芳（进步人士），理事为伍雍娴，委员为李华良。下辖妇女救护队、妇女壮丁队，共有 300 多人参加后援会。并邀请国民党合浦县县长邱桂兴的太太出任合浦各界妇女抗敌后援会名誉会长，由她发动上层社会的一些青年妇女加入合浦各界妇女抗敌后援会，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抗日救国理论。

7 月，经合浦县抗敌后援会批准，中共西场支部组建合浦第一区西场青年抗敌同志会。接着，由西场党支部管辖的沙岗党支部也组建沙岗青年抗敌同志会（由西场青抗会统一领导）。至 1939 年上半年，共建立沙岗、那龙、西坡、大坑口村、白沙头村、芋地坑、白水井村、西坡岭、茅山、野狸水村等 10 个青抗分会，参加青抗会的有教师、学生、市民、工人、农民等

400 多人。青抗会会员上街头、下农村通过办夜校、写标语、演讲、唱抗战歌曲、演话剧和街头剧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战宣传。1939 年 4 月，由于西场地处抗日前线，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西场区委员会，并指示西场区委要把西场青抗会建成一支既能宣传组织群众抗日，又有武装作战能力的队伍。为此，西场青抗会各分会都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组建由 100 多人组成的大刀队，学会各套大刀功夫，随时准备杀敌。此外，西场青抗会还负责查缉日货，禁止奸商从被日军侵占的钦州贩运日货到西场销售，并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斗争。

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建立

1937 年 12 月，南京失陷，日军准备向华南进攻。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东省需要组建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坚强的统一的青年抗日团体，以便统一领导全省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因此，广州中大抗日先锋队、附中抗日先锋队、留东学会、平津同学会、救亡呼声社、学抗、青年群社等 7 个团体联合发起组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广东抗先），并成立临时工委，于 1938 年元旦在石榴岗举行大规模露营活动，在露营中举行广东抗先成立大会。随后，在广东抗先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全省各地抗先队相继组建起来。

1938 年 8 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驻南路办事处主任陈任生从广州回合浦工作。陈任生回到合浦后，通过合浦党组织着手开展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合浦抗先）的组建工作，并把合浦抗先建队的任务交给李英敏。

9 月 11 日，日军侵占涠洲岛，惨杀岛民 100 多人；对合浦沿海渔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奸淫、掳掠。涠洲沦陷后，数千同胞逃离家园，四处流浪。日军的暴行进一步激发了合浦青年的爱国热情，“保卫大广东”、“保卫大北海”、“保卫家乡”的呼声日高，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先锋队，练习杀敌本领，准备迎击日军的进犯。

9 月，在中共合浦特支的领导下，共产党员李英敏、王文崑、黄文楷等首先在廉州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接着，均安（今总江口一带）、乾体（今乾江）、石康、公馆、白沙、小江（包括廉中、合浦一中分校）、寨圩、龙门等地的抗先队也相继组建起来。

10 月的一天晚上，均安乡抗先队同乾江抗先队联合举行夜行军演习。均安抗先队负责人事前征得乡长的同意，在乡公所借来 30 多支步枪，武装队员，进行学习。两支队伍约定时间分别从两地出发，按夜行军的要求在漆黑的夜里行进，准时于晚上 11 时许在宝塔山上会师，大家兴奋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去！”口号声震撼山野，响彻夜空。

12 月，在廉州建立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总队（总队部设在廉州中学），领导全县抗先组织。此时，全县抗先队员发展到 2000 多人。为了有利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推举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任总队长，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任副总队长，李英敏任总队政治

部主任。林增华、周胜皋只是挂名的正、副总队长，不管实际工作，总队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政治部主任李英敏手中。共产党员王文崑、黄文楷、洪廉光、陈传赞、伍雍娴、岑月英和王资桐等都是总队的领导骨干。受合浦抗先总队领导的各地抗先组织有：廉州抗先队，队长黄文楷；均安乡抗先支队，支队长韩雪洲，名誉支队长罗光熊（均安乡乡长）；乾体抗先队，队长严福远；石康抗先队，队长韩师琪；合浦东三团抗先支队，支队长范汝超，下设公馆、上廉、六湖、白沙等抗先队；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抗先支队，队长谭志伟；寨圩简师抗先队，队长黄平（刘燕帆）；龙门抗先月铲大队，大队长刘学凯，下设第一中队、第二中队。此外，从属于合浦抗先总队的还有西场、廉州等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队员 400 多人。

合浦抗先队按照《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大纲草案》的规定：“抗先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权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队员必须随时随地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并要武装自己及武装群众。”把军事训练作为活动的中心课题。

北海和廉州抗先队员，每天清晨集队沿市区（或县城）的大街小巷，一路奔跑，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口号。然后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战地救护和包扎知识。在敌机轰炸廉州和北海之后，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奔赴被炸地点，救护受伤群众。廉州抗先大刀队积极练武。每天晚上，东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点起几盏明亮的汽灯，大刀队队员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在汽灯下扎马舞刀，只见寒光闪闪，刀声嗖嗖。教练耐心传授武术，队员顽强苦练，尽管秋风萧瑟，仍汗流浹背。练武场周围常常站满观众，大刀队的练武活动，鼓舞了群众，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 年春节刚过，东三团抗先支队集中 30 多个抗先骨干到合浦五中，向当地自卫队借来 20 多支枪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由共产党员邹贞业、张九匡等讲课；军事训练由国民党退伍军官负责。生活严肃、紧张，队员集体膳宿，行动军事化。每天清晨和傍晚，五中校园回荡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的嘹亮歌声。人人同仇敌忾，随时准备迎击侵略者。

龙门抗先月铲队是在原来武术会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向来就有练武的习惯。抗先队建立后，请铁匠打了几十把月铲为武器，认真练习杀敌本领。

合浦各地抗先队员戴臂章、背挎包、束皮带，还有不少队员佩带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英姿勃勃，斗志昂扬，所到之处，群众向他们投去敬美的目光。

除了把军事训练作为活动的中心课题外，组织文艺宣传队、举办民众夜校和战地救护等，也是合浦抗先队的主要活动内容。为了动员民众抗日救国，抗先宣传队不怕长途跋涉，不辞辛劳，经常徒步下乡进行抗日宣传。

廉州抗先宣传队在李英敏、王文崑等带领下，自筹经费前往福成、南康、闸口、石康、石湾等圩镇，演出《送哥去打鬼子兵》、《四龙聚会》、《狠打鬼子》等抗日救亡节目，并同当地的抗日救亡团体交流经验，推动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巡回演出归途中，路经白花

塘到达鬼地沙滩时，敌机突然来袭，发现列队行进的宣传队，误认为军队，轮番俯冲扫射，幸好抗先队员练习防空有素，迅速卧倒，虽然不少子弹从队员身旁掠过，但没人中弹受伤。

1938年12月，廉州中学抗先队员组成12人的宣传队（钟高鉴任队长兼党小组组长），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全县各圩镇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先后前往石康、常乐、多蕉、旧州、张黄、龙门、小江、北通、古立、三合、福旺、寨圩、土东、乐民等地巡回演出，每到一地都在墙上刷写抗日大标语、画漫画，上街头演讲，晚上演出《火焰》、《太阳旗下》、《夜之歌》、《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组织群众学习抗战理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有一次，宣传队到多蕉驻军慰问演出，台上台下，军民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军民代表还先后发表演讲，军队表示，“国难当头，抵抗敌人，保卫国土，是军人的神圣职责，大家要团结一致，英勇杀敌，把敌人打出去”。群众则表示，誓做军队抗战后盾，支持军队抗战到底。演出场面热烈感人，洋溢着全民族的抗战决心和气势。宣传队这次巡回宣传演出历时两个多月。

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抗先队在共产党员陈任生、韩瑶初、宁文、谢王岗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经常深入小江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演出抗日救亡话剧，教唱救亡歌曲，讲述抗战形势和任务，出壁报，办农民识字班。分校党组织通过抗先活动在农村开展建党工作，首先在茅坡的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

公馆、白沙抗先队通过在农村办夜校组织担盐会、兄弟会、同心会，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寨圩简师抗先队通过办农民夜校，在农村建立起秘密交通、情报站。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敌机经常轰炸廉州、北海，许多房屋被炸毁，不少民众受伤或死亡。在这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廉州抗先队组成救护队，由岑月英、伍雍娴、陈传赞等带领，冒着生命危险开展救护工作。每次敌机轰炸后，立即奔赴被炸地区，为负伤的群众包扎，把重伤者送进医院。救护队多次救护受伤的民众，曾从坍塌的房屋中挖出10多个群众，使之脱险。救护队还积极做好受害者家属的慰问和抚恤工作。为了减少群众的伤亡，在每次防空警报发出后，抗先救护队员在各街道催促群众疏散，如发现有人留在屋里，就动员他迅速离开，并在街上巡逻放哨，防奸防盗。

少先队也做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西场少先队队员共有270多人，并建立大队，由共产党员朱明任辅导员，下设锄奸、缉私、防空、军事、募捐、宣传等组。锄奸组对形迹可疑的人暗中跟踪、监视，常到客栈检查，严防汉奸、日谍混入。缉私组设卡检查日货，曾缉获“美人鱼”黑布、煤油和火柴等10多担走私日货。防空组发防空警报和指挥群众疏散等。少先队员们小志气大，劲头足，受到群众的称誉。

1939年6月，由于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机关遭到国民党驻军的破坏，国民党从搜查出来的文件中，获悉合浦抗先队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后，林增华被迫辞去抗先总队总队长职务，周胜皋更是惊慌失措地辞去抗先总队副总队长职务。接着，广东省第八区督察专员邓世增把合浦抗先

总队其他领导人李英敏、王文崑、洪廉光、陈传赞等找去谈话，说要撤销抗先队，李英敏等却据理反驳，不肯将抗先队印章交出来。后来，第八区专署派人强行将合浦抗先总队部封了。中共合浦组织为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镇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不再使用抗先队这名称，改用其他形式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合浦地下党组织利用抗先队的形式，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民众，形成了合浦县空前的团结抗战形势。在抗先队及其他抗日救亡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把合浦县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使抗日救亡的呼声遍及穷乡僻壤。中共合浦地下党组织还通过抗先队的活动，在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中培养发展党员，特别深入农村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在农村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党组织，为后来建立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因此，合浦抗先队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对于团结各阶层抗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促进党组织的发展以及建立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加上国民党当局也能与社会上各种进步势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团结抗日。因此，合浦、北海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抗日力量不断壮大。为了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等政治主张，1939年4月，合浦中心县委常委张进煊授意合浦抗先总队党小组负责人陈任生，设法召开一次全县的抗日青年代表大会，以显示抗日民主的力量，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进一步推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4月底，由合浦抗先总队和其他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发出召开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的倡议，倡议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以及广东省第八区督察专员邓世增也表示支持。于是，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派张进煊和赵世尧负责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使代表大会能顺利解决经费问题，并增加官办色彩，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张进煊和赵世尧建议代表大会以一七五师政治部名义主持，并以一七五师政治部的名义邀请合浦县上层人物出席会议，林增华欣然应诺。虽然国民党合浦县党部有人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表示不满，但由于代表大会得到了一七五师政治部的支持，合浦县党部那些反对派也不敢贸然与之对抗，也就同意代表大会召开，并应邀出席会议。因此，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于5月4日至6日在张黄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合浦、北海、钦县、防城、灵山以及广东廉江和遂溪的抗日救亡团体、学校、乡镇等单位的青年代表100多人，合浦中心县委领导张进煊、赵世尧等和党员骨干张世聪、王文崑、谢王岗、邹贞业、张家保、罗永莹、邓筱筠、邓家珍等出席了会议，国民党合浦县党政军的上层人物林增华、邓世增、周胜皋等也应邀作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出席了会议。中共党员张进煊、赵世尧、李英敏等组成会议“党团”，负责召开会议的各项工作。一七五师政治部代表陈芦和张进煊轮流主持大会。会上，中共党员赵世尧、王文崑、罗英、邓筱筠等争先作了发言，使大会实质上成了宣传中共关于团结抗战、

反对投降分裂等政治主张的讲坛；各地代表分别作了工作汇报，交流各地群众抗日救国工作的经验；林增华和周胜皋也作了讲话。会议通过了军民合力惩办贪污，严惩走私，防奸和保卫北海等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议，并提出筹备成立全县青年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即全县青年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向各县市、乡镇青年发出通电，号召全体青年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有力地推动了钦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团结抗战的盛会。这次大会在中共合浦地方组织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会议大力宣传了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促进了抗日军民的团结，加强了全县青年的联合，使全县以抗先队、青抗队等为主体的青年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活跃，把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后，大会的决议立即变成行动，一七五师在南康镇的驻军和当地抗日救亡团体根据大会决议精神，截获了奸商从石头埠外运资助日军的一船大米，首次展开了有数千群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斗争。

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的成立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和打通西南通道，牵制其余战场及巩固其占领的据点，在进攻广东沿海一带后，又于1939年11月15日从钦州湾登陆，进攻广西，钦县与南宁分别于17日、24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此时，日军虽然没有占领北海，但北海与钦县近在咫尺，加上日军的飞机、军舰不断到北海附近，对市区、地角、廉州等地进行空袭，对海港进行封锁，北海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广大市民为避战祸，纷纷向农村或外地疏散，合浦一中也迁到了小江和大石屯，北海随时有被日军占领的危险。但驻扎在北海的国民党军一七五师，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作战，不认真抵抗日军的侵略，并于1939年6月撤离北海，远离抗日前线。留守北海的只有一些地方自卫队、治安警察以及一个防空哨所，全部兵力不足200人，战斗力不强，如遇日军登陆进攻，很难抵御。

面临这种危难的处境，中共廉北区委和北海党组织认为，为了抗御入侵日军，必须掌握有自己的武装。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力争合浦县第五区署的支持，建立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保卫北海。1939年11月初，中共廉北区委决定，把尚留在北海的学生、教师和其他社会青年以及国民党一七五师派驻北海的以郭兆荣（中共党员）为组长的工作组组织起来，成立一支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学生队伍，由区委委员庞自直接领导。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党组织决定，由共产党员李梓明、郭兆荣联系国民党合浦县第五区署区员李坚（刘瑞图的秘书），取得李坚的支持，一同向区长刘瑞图说明当前的严重形势和青年学生的正义要求，并提出建议，由区署提供武器、弹药、给养，由合浦一中组织人员，建立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旦日军登陆，即可参加作战，保卫家乡。由于大敌当前，形势紧张，加上李梓明及其兄弟李坚与刘瑞图有一定关系，常与刘瑞图倾谈时事，分析形势，做刘瑞图的工作。因此，刘瑞图同意提供

枪支弹药和经费，组建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

11月上旬，由李梓明、庞自带领工作队全体人员到第五区署召开成立大会，区长刘瑞图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刘瑞图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国难当头，北海处在抗日前线，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党派，只要是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我们都支持。这些话得到了全体人员的热烈鼓掌，表示拥护。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称为合浦第五区抗日武装自卫团学生队（简称北海学生队），隶属合浦县武装自卫团。李梓李明为队长，林振仁（国民党员）为副队长，庞自为政治指导员，郭兆荣为宣传员。北海学生队共有60多人（其中共产党学10多人），包括合浦一中学生，青抗会、妇抗会的会员，小学教师，海燕剧团人员和一七五师工作组成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学生队建立了党支部，由庞自兼任支部书记。会后，区署即发给工作队45枝步枪并配备子弹。学生队虽然挂名在合浦第五区抗日武装自卫团之下，但学生队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学生队的核心，学生队的主要活动计划都由党组织决定。因此，北海学生队是自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成立以后，第一支由北海党组织领导的爱国进步武装队伍。

北海学生队的任务：一是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二是协助维护市区内的治安和居民的疏散，防止盗窃、赌博、打架等不良行为的发生；三是监视海面日军的活动，配合地方自卫队随时准备打击登陆的日军。此外，学生队还派共产党员陈文山、张启泰、张家保等到大墩海协助地方自卫队做政治工作，以提高队员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保家卫国的决心。

北海学生队总队部设在北海警察所（今北海市海城区第二小学内）。下设政工组，负责全队的政治工作，还分3个分队。

第一分队部分队员（主要是女队员）驻守队部，协助总队开展抗战宣传及联络、救护工作和维护市区内的治安和居民的疏散。其余队员驻守游泳场，负责监视游泳场一带海面敌情。有一天晚上，日军武装汽艇在游泳场附近，企图作试探性登陆，被学生队站岗人员发现后，开枪射击敌艇，迫使敌艇仓皇逃走。

第二分队驻外沙岛，负责监视外沙一带海面敌情。这时，日本军舰经常在外沙海面耀武扬威，有时驶近海岸炮轰北海。队员们面对强敌的野蛮行径，经常加紧巡逻警戒在海岸线上，随时准备还击敢于入侵的敌人。

第一、第二分队除了监视游泳场和外沙一带海面敌情之外，还进行以下活动：

一是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工作。学生队的宣传人员通过刷写标语、出墙报、油印出版《学生队报》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工作。《学生队报》是三日一期的油印小报，它以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为指导思想，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分析抗战形势，指导学生的活动，鼓舞教育队员、民众。

二是进行防空救护、防盗防特工作。学生队队员轮流巡视市区，以防坏人乘机入屋偷盗，保护群众财产。每星期六，学生队队员集中学习军事和救护知识，以提高军事素质。遇敌机侵

扰轰炸，学生队队员冒着炮火，逐户协助居民疏散掩蔽，协助救护人员抢救伤员，扑灭大火，保护房屋。

三是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深入了解敌情。学生队平时十分注意日本侵略者的动向，若有日军可能进攻北海的情况，就立即报告学生队总队部。11月中旬，为了配合日军在钦县、防城登陆，敌机不断轰炸冠头岭，敌舰不断驶近冠头岭海面游弋，全市处于战时状态，居民和商人大部分已疏散，只留下老人看家。地角、外沙的渔民也冒险开船逃往外地，市内只有一些警察和自卫队。这时，主要依靠学生队维护全市治安，掩护群众防空、转移等工作。国民党一七五师撤离北海前，曾计划实行“焦土抗战”政策，在珠海路、中山路几个中心点放置了木柴、禾草、煤油等燃烧物，一旦日军登陆便放火烧街。一七五师撤走时，把这任务交给地方政府。11月14日晚上10点左右，冠头岭防空监视哨来电话报告说：“发现有四五十名日军乘船驶向冠头岭。”区长刘瑞图接到报告后，未作深入了解情况，就断定是日军进攻北海，于是刘瑞图遵照一七五师的旨意，立即下令秘书李坚通知学生队放火烧街，并催促居民紧急疏散。但是，学生队负责人接到刘瑞图的命令后，没有立即执行，认为放火烧街是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先把情况弄准确再作打算。于是，学生队队长李梓明立即叫区署的话务员曾琳打电话与冠头岭哨所联系，复查核实情况。经一再查询，原来是日军在钦县龙门登陆，钦县犀牛脚乡的群众连夜开船逃到北海避难。因此，刘瑞图撤销放火烧街的命令。由于学生队的努力，北海才避免了一场火劫，否则，北海会像长沙那样，毁于一炬了。事后，学生队党支部认为，放火烧街是错误的做法。烧了街，不仅全市人民遭到巨大损失，居民流离失所，无处栖身，也阻止不了日军的补给和进攻。学生队负责人向刘瑞图申述了这种利害关系，并得到刘瑞图的同意，派人撤除所有的放火点，免除后患。

第三分队驻北海郊区东星乃沟村，负责做后方群众工作，准备开辟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乃沟村位于北海、合浦、福成的交界处，第五区署在那里设有一个物资仓库，存放着一批枪弹、被服等。学生队党支部认为乃沟村是个开展游击战有基础的村庄，因而计划在日军一旦攻占北海时，以学生队为基础，利用第五区署的武器物资，发动当地农民，在乃沟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学生队刚到乃沟村时，当地群众不了解这些带枪的青年学生，不同意他们进村住宿，只让他们住在村外的一间旧油坊里，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10多个人住得很拥挤。但学生队员热情很高，一住下就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抗日，说明来意，并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劈柴，下地干农活，逐渐得到群众理解，知道学生队是为了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而来的，便让学生队住进村中的祠堂里。学生队进村后，严格遵守纪律，不损害群众利益。有一次，队员们在擦枪的时候，有一个女队员不慎走火打中禾草棚，不知何故草棚起火了。学生队将火扑灭后，向群众道歉，并照价作了赔偿。更使群众感动的是，队员们把带来的不多的药品，用来帮助患病的村民治病。因此，学生队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接着，学生队便发动群众，广泛开

展抗战宣传教育工作，举办农民识字班，教群众识字，结合讲述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道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并出版墙报，组织少年儿童唱抗日歌曲，鼓舞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12月，第三分队队长潘伟德离开乃沟村后，中共廉北区委从合浦战地服务团抽调谭俊到乃沟村担任第三分队队长，并将第三分队党小组改为党支部，由谭俊兼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从合浦县城抽调中共党员王文崑、罗志辉到该支部协助工作。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谭俊到乃沟村后，深入村里与村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工作），选择贫苦农民为教育培养对象，积极发展党员，发展党组织，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和群众基础。

1940年1月，国民党沙岗自卫大队副队长王国光参与奸商活动，外运大米、桐油等物资资助占据涠洲岛等地的日本侵略者，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国难财。并且奸商活动越来越猖獗，造成粮价暴涨，人民深受其害。2月21日，中共廉北区委和西场区委发动反奸商的群众性请愿斗争。北海学生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连夜奔赴廉州，会同合浦战地服务团等组织，发动群众一起参加请愿。学生队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演说，编写宣传材料，揭露奸商罪恶。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2000多名各界群众到合浦县政府参加请愿行动，县长李本清被迫与群众见面，答应降低米价，查办奸商。

北海学生队参加请愿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的注意。而日军侵占南宁、钦县所形成的钦廉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国民党合浦县当局便采取了种种手段，扼杀学生队。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先将支持北海学生队的区长刘瑞图调任合浦县参事，改任李本清的亲信潘承銮为区长兼警察所长，并免去经常与北海党组织接触的李坚五区署职员之职，继而停止学生队的供给，下令解散学生队，收缴学生队的武器，还逮捕了学生队队长李梓明。3月，北海学生队被迫解散了。学生队解散后，队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农村山区，继续开展抗战工作；其余的爱国青年和学生分别到各地继续坚持抗日救国工作。

合浦战地服务团的成立

1939年11月，日军在钦县、防城登陆，占领南宁，国民党军队基本撤出合浦、北海，战争阴霾笼罩着廉（州）北（海）大地。这时，群众疏散，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人心惶惶，迁至廉州附近大石屯的合浦一中也宣布停课疏散。为唤起群众，坚持抗日，稳定人心，安定秩序，准备在敌后开展斗争，合浦一中党支部成员罗永莹、谭俊、邓爱莲及廉州地下党组织成员王文崑、庞达、王资桐等，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研究决定成立合浦战地服务团，领导人为罗永莹、谭俊、王文崑、庞达。战地服务团集中青年、学生在廉州东岳庙学习政治、训练军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培养抗日骨干力量。这一决定传到北海后，在北海的30多个合浦一中学生立即赶往廉州，加入合浦战地服务团。合浦战地服务团共有100多人。

合浦战地服务团仿照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学习和生活。战地服务团设组训、宣传、救护、战

地服务等股，过着军事化生活。每周有两三个下午，进行军事训练。每天早上，唱《抗大校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歌声嘹亮，响彻廉州城上空；晚上，战地服务团成员三五成群，或谈心，或串访邻近居民，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战地服务团还设有“救亡室”，由地下党组织及党员提供图书、杂志，其中有《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大众哲学》、《论政党》、《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给战地服务团成员阅读、学习，并由理论水平较高的党员上辅导课，分组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注意合浦战地服务团，国民党合浦县党部部长兼一中校长周胜皋，合浦县民兵团团长、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王满儒，合浦县政府秘书王佐彝等经常以“关心”为名，到战地服务团窥测动静。

合浦战地服务团积极做好战地服务工作。这时国民党军大部队龟缩后方，只有小部队驻在钦廉线上的乌家圩一带。由于国民党军官层层克扣军饷，士兵给养很差，时值严寒，为提高士气，争取他们坚持抗日，战地服务团在廉州镇发动群众，开展捐赠寒衣、慰问前线将士的运动。经过宣传动员，募集了大批寒衣，并送到乌家前线劳军，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日军侵占涠洲岛后，为组织教育群众，并与合浦各地反运米资敌的斗争配合，战地服务团成员在合浦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要求国民党合浦县政府禁止运米资敌的请愿行动。

国民党顽固派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争权夺利，内部又有无法调和的矛盾，都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扩充实力。因此，国民党顽固派都想把合浦战地服务团拉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为其独家的驯服工具。周胜皋认为，战地服务团成员大部分是合浦一中学生，理所当然由其掌握这支力量。但合浦一中学生并没有买周胜皋的账，周胜皋想利用战地服务团，总是不能如愿。王满儒曾帮助战地服务团搞军事训练，三青团又“关心青年”。因此，王满儒认为战地服务团成员对其有好感，可把战地服务团拉过去成为三青团的势力，但王满儒的梦想亦落空了。县长李本清虽是外地人，但其手中有权，便想玩弄权术把战地服务团据为己有。合浦战地服务团领导便利用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矛盾，开展有利于抗日的工作，并达到激化他们矛盾的目的。不久，李本清利用特权，要把合浦战地服务团改称为“合浦县动员委员会干部队”，并允许战地服务团派人到县动员委员会工作。战地服务团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认为不能放松警惕，但如恰当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会有利于党组织利用矛盾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县动员委员会顾名思义是动员群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于是，同意战地服务团改名，并派战地服务团领导罗永莹到县动员委员会任干事（战地服务团的其他领导谭俊、王文崑等已调到北海乃沟村或别的地区工作）。战地服务团改名后，李本清以为得计，得意忘形，迫不及待地派其亲信、县动员委员会秘书苏光镇等几个人插到干部队来，妄图直接操纵干部队。但是，干部队还和改名前的战地服务团一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坚决执行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苏光镇在干部队发号施令不灵，其带来的几个人也被孤立。李本清除了增加县政府与县党部、民团的矛盾外，妄图操纵干部队的黄粱美梦彻底破灭了。合浦地下党组织终于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图谋，确保了党对战地服务团的领导权和组织的独立性。

1940年3月，干部队为了组织教育农民，培养和锻炼抗日骨干，派出10多个队员，到南康石头埠，深入附近的卧龙村等村庄，与农民一起劳动，对当地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久，战局缓和，学校复课，干部队的合浦一中学生便返回大石屯复课。后来，在合浦一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顽固派

合浦一中党支部和廉州地下党组织，及时组织和领导了合浦战地服务团，历时4个多月，即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为夺取北海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虽然上海、南京以及华北、华中大片国土沦陷，可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给革命带来希望。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挺进敌后，打了不少胜仗，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开创抗日战争的新篇章。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指明团结抗战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的发表，坚定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抗日战争开始后，地处北部湾的北海地区已经是战争的前沿，日军战机军舰天天来轰炸炮击，涠洲、斜阳两岛不断遭到蹂躏劫掠，后来成为日军侵占海南、广西的基地。北海地区的青年抗日意志比较坚强，思想比较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拥护工农红军，向往革命圣地延安，抗日进步思想成为北海地区青年的风尚。这些抗日进步青年充满危机感和紧迫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甚至把国民党报纸和抗敌后援会争取过来，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但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深恶痛绝。在抗日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们不禁暗暗思忖，要抗日，要革命，非依靠共产党不可，非有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这时，在武汉、广州等地出版的共产党刊物上，刊登了很多介绍延安和八路军的文章。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在一个进步刊物上刊登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广告并介绍到延安的手续办法。1938年4月，当北海地区的许多抗日进步青年看到招生广告后，通过各种关系、各种途径，纷纷投奔延安，追求革命真理。投奔到延安的有：廉州中学学生邹瑜、辛莽、李廉东、谢潼关、易治仁、凌瑜、白原（钟逢美）等，合浦一中学生陈广才、林朗天、林施均等，还有进步青年黄铸夫等。这些投奔延安的北海地区进步青年，在党中央的精心培育下，大都成为栋梁之材。